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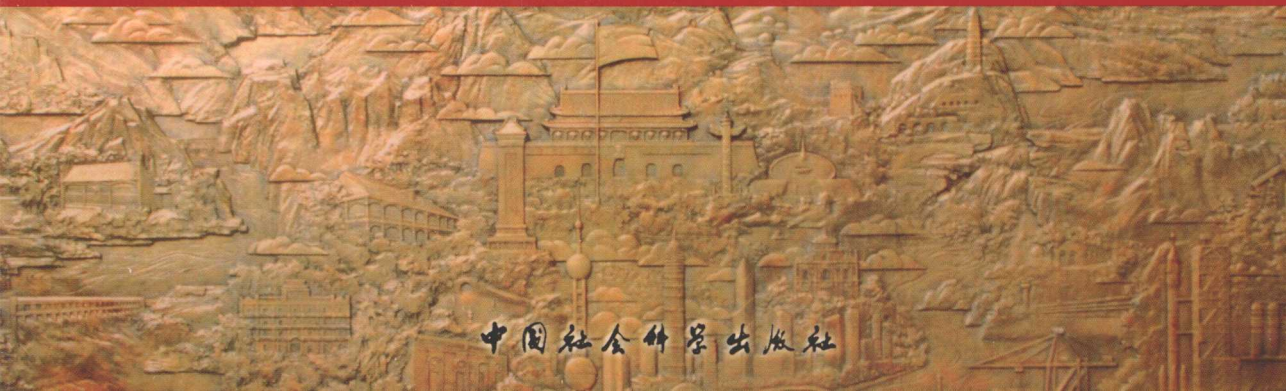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MAOZEDONG YU
ZHONGGUO SHEHUIZHUYI SHIYE

梁 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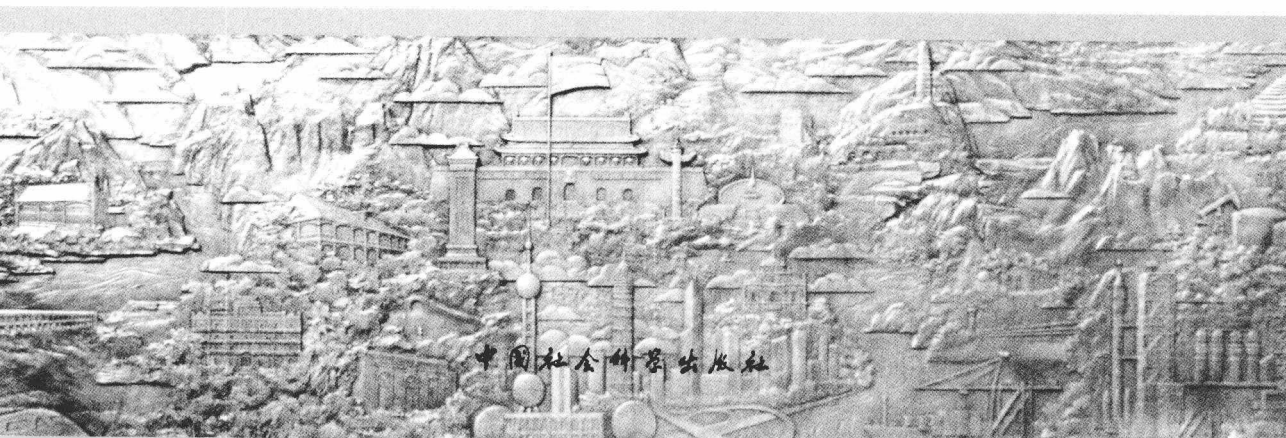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MAOZEDONG YU
ZHONGGUO SHEHUIZHUYI SHIYE

梁 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 梁柱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ISBN 978 - 7 - 5004 - 8263 - 5

I. ①毛… II. ①梁…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A84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102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编委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任： 金冲及

委 员：	于 沛	朱佳木	齐德学	李文海
	李 捷	陈祖武	张启华	张星星
	张海鹏	何 理	沙健孙	武 力
	孟昭宇	赵剑英	梁 柱	程中原
	董志凯			

前 言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节日，同时也是为了检阅国史研究的业绩，促进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从长期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中遴选了一批作者，将他们的自选文集汇编成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予以出版。

本丛书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每本文集的书名由作者自拟，目录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或专题排列，书后附后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同志于 200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的讲话，对如何正确看待和研究新中国 60 年的历史，作了深刻的阐述。这篇讲话与本论丛的编辑宗旨完全一致，经征得本人同意，作为总序放在每本文集的卷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编委会

2009 年 9 月 30 日

总 序

正确认识新中国 60 年，为推动 国史研究作出新贡献*

陈奎元

回眸新中国的 60 年，是光辉灿烂的 60 年，是令共产党人、全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 60 年。以 60 年为着眼点，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历史上各个兴旺的时期比，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各个大国开国以后的历程比，不仅是毫不逊色的，也是无与伦比的。在国际共运史上，18 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倒塌，苏联共产党在压力下自动解散、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土崩瓦解，国家解体，人民陷于困境，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自溃，形成历史的倒退，这是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惨痛曲折的一页。那时中国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安然渡过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站在了时代的潮头，正像宋词中所描写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①，党中央坚如磐石，坚持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传统，走向改革和发展的新里程。到今天，回顾 60 年的风风雨雨，应当相信和肯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奠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江山根基是牢固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成功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

* 这是陈奎元同志 2009 年 8 月 26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节选。

①（宋）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载《唐宋名家词选》，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2 页。弄潮儿，《全宋词》作弄涛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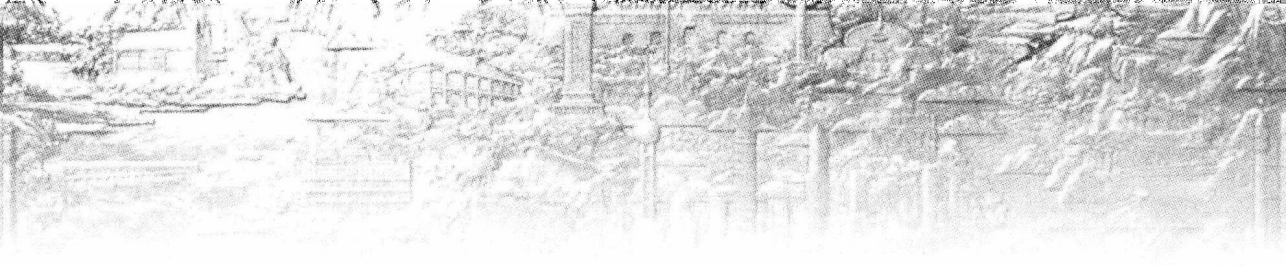


中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就是显著的。假如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降下自己的旗帜，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卑躬屈膝，今天有谁会来研究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何以被人称作“金砖四国”之一？中国怎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国13亿人会面向什么样的未来？

如何对待中共的历史，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严肃的科学事业，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研究国史要求政治思想性强，要讲政治、讲正气，要秉持古来史学家优良的道德操守。有关国史的著述一字千金，决不允许凭个人好恶臧否革命领袖和其他先烈。“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人地”，轻薄为文、信口雌黄，不但是对先人的不敬，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捉弄。国史研究者应当善于明察，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

经历60个春秋，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选择也逐渐淡漠，有些人对国家取得的成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看到有些不尽如人意处，也不知根源何在，看不清中国未来的前途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甚至发生某些误解，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听信那些告别革命的呓语，这种种疑惑就会使人们疏远并最终脱离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统治下的凉州地方首领张骏不忘故国，他在向东晋皇帝的上疏中说：“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①这几句话用之于今天，足以发人深省。我们国史工作者应当弘扬前辈的志愿，启发人们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不要日远日忘而是日久弥新。

① 《资治通鉴》（卷95，晋纪17，成帝咸康元年）第7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004页。



★★★★★目录



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民主

政治建设	(254)
毛泽东文化观的若干问题研究	(272)
毛泽东执政观的若干问题研究	(290)
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障碍	(298)
共产党员要同“官国”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321)
新中国第一次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启示	(327)
道是无情却有情	
——1949 年后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341)
国史研究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359)
后记	(374)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毫无疑义，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巨大功绩及其深邃的思想理论，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并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

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东方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由于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已追随大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毛泽东也曾有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的看法，同意“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苏维埃”的主张。但他在深入实际调查中敏锐地觉察到，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①因而在根据地建设中注意抵制冒险主义错误，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深化了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②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联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绝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中国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于：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① 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②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一、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二、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①正是在这个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因而能够在中国革命胜利并具备了基本条件之后，不失时机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

二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尔后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政治制度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地说，以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随着近代中国历史价值取向的转换，新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摒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而实行体现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



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因而“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①毫无疑问，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这样的政党制度，在原则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它有利于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高度地凝聚起来，而不是西方多党制那样互相倾轧，互相争斗，互相抵消力量。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而制定的政策和选择的制度。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之，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保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经济建设上，在毛泽东时期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培养成长起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各类建设人才，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

应当首先指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不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其三，我们还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② 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出现曲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初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以铁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人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正在逐步消灭，人民政府还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一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执行并有望提前完成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有过失误，付出过很大代价，但这仍然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等，大多是在这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个时期打下的基础，填补了我国工业上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10年中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长，1966年同1956年相比，钢铁、煤炭、石油、发电量、机床分别增长了245%、129.9%、1154%、397%和112%。二是，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兴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水浇地面积增加2600多万亩，拖拉机拥有量和化肥施用量增长六倍以上，机耕面积由1957年的2.4%提高到1965年的15%。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到1956年，专门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各个产业部门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装备、条件较好的科学研究中心。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科技队伍从1957年的120多万人增加到1963年的230多万人。在资源勘探、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技术以及基础科学理论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新的突破。高新科技得到一定发展。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到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的第一枚运载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我国先后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1965年着手制定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空间计划和相应的各方面研究工作。这些都有力地显示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四是，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学校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新建和扩建的各类高校近30所，10年中高校毕业生达到139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的规模和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各类业余教育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素质。这10年间，各条战线都培养出了一大批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学有专长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经历了重大挫折，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损失。但应该看到，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艰苦努力，使经济建设在总体上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由于有上半年增长的基础，1966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增长20.9%，农业总产值增长8.6%。1967—1968年是局面最为混乱的两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7%，工业总产值下降13.8%，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6%。196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下降4.1%，工业总产值下降5%，农业总产值下降2.5%，这一年社会生产的规模只相当于1966年的86%。从1969年开始的七年，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3%。而1976年则因受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冲击和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6%，其中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4%，农业总产值下降0.4%。

总之，从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是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在外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美国不仅拒不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止其他国家承认，并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目的是要通过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从而使新中国政权无法立足。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 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企图封锁中国的链条。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1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为巩固我国革命胜利成果，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十七大指出：“我们要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